

《美国总统小布什最爱读的五本书》之

美国同情心的悲剧

(The Tragedy of American Compassion)

作者：马文·奥拉斯基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

美国同情心的悲剧

马文·奥拉斯基 著

内部参考 注意保存
未经允许 不得外传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

此书被誉为是：“关于美国福利和社会政策最重要的一本书”，是美国总统小布什在制定美国福利政策时的重要参考书，美前众院议长视此书为“美利坚契约”的蓝皮书。

内 容 提 要

马文·奥拉斯基的《美国同情心的悲剧》（The Tragedy of American Compassion, 1992年初版）被誉为20世纪90年代“关于福利和社会政策的最重要的一本书”，是美国总统小布什在制定福利政策时重要的参考读物。美国前众议院议长金里奇曾将本书视为其构思“美利坚契约”的蓝本。

本书通过分析美国救济穷人的几种模式，力图为陷入死胡同的“美国同情心”找到出路。其中心思想是：美国人从小就被告知要有同情心，特别是要帮助穷人。因此，政府设立多种反贫困项目，宗教和社会团体成立各种救助组织，富人捐款成立各种基金会，美国日益成为“福利社会”。但同情、慷慨、乐善好施这些原本是美国优良传统的东西，而今已成为引起社会不满和腐败的重要原因。从上世纪60年代起，美国穷人的心态发生了变化，宁愿接受社会福利也不愿自食其力。因此，政府只有减少救济，让更多的人就业，恢复紧密的家庭和社会关系，才是解决贫穷化的出路。

前言 当前的僵局

圣诞节的华盛顿，社会的钟摆在摆动。在 12 月的寒夜步入联合地铁站就像走进了一个神奇的王国：古典音乐回荡着，大型购物商场里高级店铺依次排列，就连“美铁”（全国铁路客运公司）的候车室总体说来也干干净净。但联合地铁站之外，那些远离明亮灯光的地方，却唱着不同的歌。乞丐们等在地铁站口的电梯下行处，有些表现得从容不迫，有些醉醺醺的，偶尔带点儿攻击性，还有一些则可怜巴巴的。一个带点幽默感的人还唱着，“富有的人啊他在明炉上烧烤，无家可归的人啊他踮着脚跳”。

就在这回家过节的时候，美国首都的两类人各走其路。大多数人，无论是官员还是职员，回家与亲朋好友相聚。有些人则成了地铁站的自愿看门人，试着从那些手提包裹又有些负疚感的人手中多乞几个硬币。大多数境况较好的人回避与显然很贫穷的人进行目光接触。他们知道这些人中肯定有无家可归的，却不知道该如何对待。

这种不知如何是好的困惑并不是由于缺乏教导者造成的。遍布全国的早间谈话节目和报纸日复一日地告诉我们要对穷人“富

有同情心”。最近，“同情”这个字眼像是给社会解决痛苦的止咳糖一样挂在人们的嘴边。我发现五大报纸也是众口一词，“同情”这个字眼几乎出现了三百次。不过，“同情”就是意味着在地铁入口处施舍一块钱，或者为联邦住宅计划拨款 10 亿美元吗？那些拒绝施舍钱或拒绝拨款的人是“在明炉上烧烤”的富人吗？在 20 世纪 90 年代，这些人是否作好了因自私而下地狱的心理和社会政治现实的准备？

我们应该怎么办呢？一位慈善领袖说过，“重要的是，我们必须以一种方式或任何方式介入其中”。但所有的方式都是好方式吗？打个比方，虽然我们有一柜子药瓶儿，但显然不会随意抓起一瓶就用。难道药瓶儿上没有警告标签，或至少提示某某药品要和某种食物或与牛奶一同服用吗？一个华盛顿的民谣歌手曾唱道，“如何帮助无家可归的人？”“答案就在风中。”当答案像蝴蝶一样在风中振翅飞过，我们能用蝴蝶网抓住它吗？

不。答案并没有在风中吹，答案也不必像《艾丽斯漫游仙境》中那样非得吃点啥喝点啥才能奏效。答案就端坐在国会图书馆书架深处的旧杂志和报告当中。我们现在遇到的问题跟一个世纪前住在城里的美国人遇到的问题没啥区别，但他们拿出了真正富有同情心的解决办法。我们可能没认识到这一点。因为在美国历史上，我们只能找到两种如何与贫穷作斗争的书。一种书的论点是，自由市场本身就能解决所有贫困问题。另一种更传统的办法则强调，政府干涉以重整经济关系结构。但这两种书既没有强调真正富有同情心的个人和组织在长期反贫困中所发挥的关键作用，也没超出对 20 世纪前的道德同情心理解的自鸣得意的反对和忽略。

由于历史理解不能提供见多识广的精神，所以美国有关贫困

的争论陷入一种困境。在华盛顿，政治领袖大谈特谈如何帮助穷人。但即使是“同情”这个曾有能力支配行动的字眼也已成为共和党人和民主党人定期做秀的修辞工具。在全美，“同情疲劳症”成为人们厌倦滥用慷慨的原因，或者显然成为慷慨无用论的证据。就像专栏作家艾伦·古德曼所言，“对我们大多数人来说，慷慨正以一种缓慢的过程转为憎恨，同情心也变得冷酷无情了”。

有思想的记者正出手论道。专栏作家威廉姆·拉兹伯利最为典型：“就像全美的其他城市一样，华盛顿正在做收容无家可归者这项没用的工作。但是，我也不知道如何才能做得更好。”混乱则支配了哲学家和政治理论家的思想。詹姆士·费士肯在其《责任的限制》一书结尾处极诚实地放弃提出任何解决办法：“我们的假想和行动的确需要做出一些重大修正，但连我本人也深深限于思想困境之中，所以我并没有倡议任何特别的解决办法。”是啊，当我们坐而论道或逐渐放弃时，一代代的人也失落了。市中心医院的婴儿无法控制地颤抖抽搐。少女妈妈和哇哇哭闹的孩子为生计奋斗。30多岁被丈夫抛弃的妇女在冰冷的福利部门等着自己的号码被叫到。无家可归的汉子不耐烦地排队从食品货车领取食物，然后拖着脚步到充满尿臊味的小巷子里吃吃喝喝。

好消息是困境可以解决。如果我们重获一个世纪前拯救了那么多生命的观念，如果我们同情的概念不再堕落、如果设身处地地想像一下社会灾难，我们就能找出解决办法。未来的关键在于理解过去。该书尝试通过展现历史，提出一种争论贫穷问题的新方式和走出困境的新方法。

目 录

前言 当前的僵局·····	(1)
第一章 美国早期的同情模式·····	(1)
第二章 变城市为乡村 ·····	(20)
第三章 慈善共识的第一挑战 ·····	(38)
第四章 来自社会达尔文主义者的威胁 ·····	(57)
第五章 给社会达尔文主义纠错 ·····	(81)
第六章 同情的七大标识·····	(104)
第七章 为什么不多做点? ·····	(124)
第八章 令人振奋的新世纪·····	(142)
第九章 旧瓶兜售新政酒·····	(158)
第十章 革命及其伤痛·····	(175)
第十一章 20 世纪 70、80 年代的问题 ·····	(194)
第十二章 将同情付诸实践·····	(211)
第十三章 历史应用·····	(229)

第一章 美国早期的同情模式

20 世纪 80 年代，美国一个名为“基金理事会”的慈善协会进行了一次新闻发布，称筹集到会员捐献的几十亿美元。报纸称这个理事会是“人类历史上最慷慨的团体。”就钱的数量而言，这种最高称誉可能是准确的，但殖民地时期缺少现金的美国人却在其它方面超过了这种“慷慨”——这个词汇在那个年代通常与金钱无关，而是与人品的高贵相关，正如莎士比亚在《劳动者失去的爱》一书中所说的，有亲切谦卑之意。

美国早期那种慷慨模式强调，在困难的时候需要个人援助。1620 年，寻找美国的领导者威廉·布拉福德在普利茅斯登陆后，是这样描述疾病因素是如何导致那一小群定居者减员的：“只有 6 个健全的人”可以移动，“在最穷困的时候……期望白天黑夜都没有痛苦，只盼望拥有自己的健康，能得到可烧的柴火，烤熟能吃的肉，烧开可喝的水，可以洗脏乱的衣服，可以缝缝补补；一句话，期望得到居家的必需品。”

布拉福德写道，他们“做了所有乐意和高兴的事，没有任何勉强，将真正的爱给了他们的朋友和兄弟同胞。”

早期的美国模式也重视好客，特别是对那些因灾难而忍受穷困且要重建家园的人们。1673年4月16日，据康涅狄格州一个名叫费尔弗德的镇理事会会议记录显示，“当地乡绅和居住在花岗石地区的山姆（同意），如果居住在小山顶的家庭处于最困难的时候，就愿意照顾他们。”1753年11月，马萨诸塞州车姆斯福德镇会议也有同样的记录，“已死亡的约翰·科里留下了一个可怜的孩子琼娜·科里，W·帕克尔先生将领养她，并负责将她照顾到18岁。”受人尊重的慷慨主要是雪中送炭（强调及时），而不是财富，这一点十分重要。向寡妇或孤儿提供住房的人们，通常都可以得到镇理事会或其他社团组织的现金补贴。

这种模式也强调有些受助者的“体面生活”。例如，类似“苏格兰慈善协会”（成立于1684年）的团体“开启了我们内心对一些人群的同情”，比如失去手臂的寡妇斯特瓦特和那些在风暴中失去丈夫的人们。不过，援手并不是伸向所有的人，社会准则规定“那些好吃懒做、品行不端的人不应该得到同情。”有自立能力的人应该在不断增长的农业经济中找到工作；如果他们选择不干活，那么通过压力使他们改变态度是完全合适的。

强调个人帮助和慷慨常常是布道时经常提到的内容。布道在殖民地时期“对形成文化价值、方法和合作目标的感觉是很有力的。”“布道成了公众每周进行公共交流的独特方法”，在这种场合人们可以听道，可以讨论，这是其他媒介普遍缺乏的。1725年，本杰明·科曼写道，“在安息日仪式上，主持者常常将那些对穷人和需要帮助的兄弟同胞提供同情和怜悯的人尊为圣人”，人们倾心聆听。科曼对听众解释说，“对穷人的同情和怜悯与上帝意志一致”，这时候很难想象会有人说自己不想与上帝保持一致。

公理会教友和长老教会员的布道通常都提到，缺乏同情行动

的信仰是死的。英国教徒也认为受上帝赐福的人应该“同情”穷人，当穷人需要帮助时应帮其振作起来，“这样的生活秩序才是正确和好的，才是和谐的。”当18世纪美以美教派教会在美国传播的时候，信徒们遵循了约翰·威斯勒的信条——“把你自己放在每个穷人的位置，对待他们时就像上帝可能也是这样对待你的。””

唯一的问题可能是，我们要上帝如何对待我们？是像冷酷的官员那样给别人提供物质但没有关爱吗？还是像父亲给子女糖块那样没有原则？在建设慈善制度时，文化往往是以人们信仰的上帝形象来传播，而不管你是冷漠的自然神论信仰者，还是装模作样的好教徒，或者是“什么都不信”的人。在殖民地时期，强调信奉兼具公平和怜悯心的上帝，通常可以有助于增进对同情的了解，而这种同情又通常具有思维定式和热心肠的特点。由于公正就意味着对错误的惩罚，因此忍受懒惰可以说是对的。还有一点，当人们从过去的经历转变时，怜悯意味着快速回应，因此恶毒地忽视那些重新形成的愿望也是错误的。随着信仰上帝的观念改变，慈善制度也会改变。但在美国早期，这种改变也被认为是将那些不信神的人放在具有挑战性的经济制度中的正确方法。

有神论式的理解还可以引出其他重要话题。首先，那种认为上帝不仅仅是原则的创立者，而且还是个人介入者的观念有助于培养这样一种感觉，即人这种在上帝形象之后产生的东西，应该远远超越普通的施舍行为。

上帝认为我们的精神和心胸远远超越我们拥有的金银和牛羊。如果一个人愿意交出他所有房屋之类的物质，而不愿意给予爱心，给予发自灵魂的爱，他也应该受到谴责。

其次，经济状况好的人应从个人角度了解穷人，了解他们截

然不同的性格，这一点也很重要。今天信奉“自由原理”的人经常认为上帝站在了穷人一边，但以往的区别却表明，上帝支持那些受虐待的穷人，惩罚那些好逸恶劳的人。

第三，相信上帝的准则遍及生活的每个方面。这意味着，即使是不忠实的穷人，他的最重大需要也将是了解上帝和上帝对人类的期望。精神和物质方面的帮助是一种义务，而不是祈求，下面这段格特鲁德·希莫法布的话表达了相似的意思：

对个人来讲，没有什么可吹嘘的。个人尤其不应吹嘘没有道义、宗教等方面东西的经历，这种经历对那些并非一贫如洗的人来说，却是他们生活的正常部分。

第四，殖民时期神学意识强调不断坚持慈善。现在，事实上每个人都是慈善家。那些向慈善事业捐款的人，或向无家可归者提供食物和毛毯的人，应该得到表彰；甚至那些向吸毒者提供干净针头的人通常也该表扬。但殖民地时期的怜悯更加谨慎。1689年，科顿·马泽尔警告他的教友，“我不是忠告你们要增加慈善，而是要忠告你们不要形成滥用慈善的陋习。”他还补充说，“我们做好事时应该运用这样一种观念，即做好事就像邪恶的人干坏事一样。”

马泽尔的克制与我们的放纵之间存在很大区别，这种差别事实上表明了过去与现在有关人类本性的主导观念之间的区别。马泽尔并不是假设人们天生就想要工作。他的观点，以及两个世纪来北方和南方多数领袖的观点都是，如果让人们在工作和不工作之间做出选择，那么多数人会选择坐着不动。他和其他人在看待穷人时，不是将其看作处于社会阶层的底部，只能选择停滞或向

上移动，而是好像处于中间部位，有能力向上移动争取经济独立或向下移动等待被救济，后者是一种被击败或依赖的思想，同时也缺乏积极性。

马泽尔的思想正是建立在此基础上的。1710年，他向所在的圣会提出了对游手好闲者的态度：“不要纵容他们，也不要鄙视他们，要为他们寻找就业机会。给他们找工作，让他们工作，使他们保持工作。”（马泽尔补充说，“如果你的任何一间房子对邻居造成威胁和毒害”——现在我们将其称作危房——“那你对邻居的慈善就是尽你所能将其推倒。”）

在整个殖民地时期，这种意识一直受到公认。例如，1752年，查尔斯·昌西对“鼓励工业和雇佣穷人协会”的成员说：

他们分发慈善物品时受到限制，不允许不加区分地分发，他们有义务采取适当措施找出合适的目标；适当区分那些有能力但需要帮助的人和那些没有能力而需要帮助的人，在雇佣这些人时
.....

耶稣十二使徒之一的保罗在《新约圣经》中说，“不劳动者不得食”。昌西在评论这句话时说：

该规则在字面上是天堂的一条法令，它捆住了向偷懒的人施舍慈善的手脚。而且，就我的理解而言，它打破了福音书准则，就像自然界一样，它用这些规定打破了慈善准则。如果人们不愿耻辱地消磨时光，他就应该挣钱养活自己。

社会政策就是以强调人的罪孽深重这一宗教观点为基础的，

只有上帝能够改变它。在这个意义上，社会态度可以改变我们对宗教的基本理解，我们可能把那些支持这种观点的人叫做“社会加尔文主义（欧洲新教的一个流派）者”。由于传统上有地位的人欢迎信奉天堂的人，而警告那些蔑视地狱危险的人，因此社会加尔文主义者试图用两种方法将穷人带上正确道路，一是用积极的刺激方法（“工作，争取独立”），另一种是用消极的方法（“不工作，等着挨饿吧”）。他们认为要准确地理解人类，第一步就必须从《圣经》上理解宗教，反过来，这也会有助于他们向相反的方向转变。

事实上，由于工作是可能获得的，因此就没有必要讨论结构性失业；相反，应该救济的贫穷类型主要是不可抗力引起的，如火灾、地震、突发灾害事件或夭折（经常由疾病引发）。受到这些灾难的人应该得到个人帮助，比如，可以在遇到上述情况时经常到邻居家避难。对那些酗酒或“不守规矩”的急躁人，以及拒绝工作的人，镇上往往为他们建立工作点。制度很严格，一个名为克姆斯福德工厂的第7-12条章程是这样规定的：

7. 工厂管理人员有权通过发放奖金奖励那些忠实勤奋的人……有权处罚懒惰、固执、不守规矩和不遵守制度的人，可以立即限制他们的食物供应，如只向他们提供面包和水。

8. 工厂管理人员要促使指定的房屋和设备保持清洁和整齐，敦促人员养成爱干净、整洁和庄重的习惯，所有进厂工作人员都应严格遵守。

9. 工厂管理人员应敦促礼拜日制度得到严格遵守。

10. 每个被指定工厂接纳的工作人员或该工厂的成员必须遵守秩序和规定，服从管理人员，按照要求勤勉地工作和劳动，而

不论其年龄、健康和能力。

11. 任何旷工的工人都将被认为是懒惰、顽固和不守秩序的人，并将按规定受到处罚。

12. 严格禁止酒精类物品，除非是工厂管理人员、医生或工厂监督准许，任何人不准在工厂拥有、藏匿、携带或接受酒精类物品。

对拒绝接受工作或坚持饮酒者的处罚包括鞭打。强迫有劳动能力的人工作不会被看作是压迫。因为我们的目标是将所有人视为有责任的社会成员，而不是动物。

殖民地时期的美国人希望对孩子进行适当训练。不论贫富，都有为今后的生活进行这种学习的需要。“慈善学校”的建立是有合理性的，正如马里兰州的托马斯·培根在一次布道时所讲的：

感谢上帝，我的兄弟们，我们实际上拥有一个非常丰饶的土地。我们应该通过劳动来促进对上帝的信仰，并以此来感谢他，如果没有诸如此类的规定（如向穷人提供工作机会，要求他们诚实劳动），这种信仰就难以推行……

在新英格兰的加尔文教堂和中南部各州的许多教堂，这种意识实际上都存在。培根开办的穷人学校接受贫困儿童，不论他们是白人还是黑人，并且强调所有儿童要阅读《圣经》，直到19世纪30年代南方部分州对废奴运动反应过度。

所有人的学校和为所有人工作的观念也逐渐被带到了西北部地区，那里的法官任命了“监督穷人的工头”。他们的职责就是建立穷人住所，而这种住所却由居住者的劳动来维持。甚至“最

堕落”的人也不必挨饿，因为穷人住所（这可能是种可悲的想法）可以向他们开放。另一方面，在穷人住所外面，没有人有权利接受别人提供的物资：

如果任何穷人拒绝在这种房间或房屋住宿、居留或就业，他（她）在拒绝期间就没有权利从监督者那里接受救济。

有些个人或教堂可能的确在这种严格制度之外帮助过“值得帮助的穷人”。但那种由穷人住所外面提供的“户外救济”，或受某些方面委托的“户外救济”，却可能被视为能轻易让人逃避应尽责任的不良东西。

19世纪以前的反贫困原则强调家庭关系。在支持家庭某一成员时，那些可能导致家庭破裂或丧失家庭中心地位的做法都不会得到鼓励。这种意识也反映在西北部地区的早期法律中。这些法律规定父母、祖父母和“任何贫穷、年老、瞎、跛和无能力的人，或者不能工作的其他穷人”的子女，应该“救济和承担他们的生活”，除非他们自己也没有经济能力。那些不向穷人提供类似帮助的近亲将受到严厉处罚。而且，给每个穷人准备的马桶（如那种在家庭邻里使用的三腿凳）也要放在规定的地方。

三腿凳在乡村和其他小镇用得很普遍。随着城市的膨胀，要求向的确需要帮助的人提供援助的组织也相应增多。美国宪法颁布后不久，纽约、费城、巴尔的摩、波士顿和其他城市都建立了孤儿院。一些组织开始向谋生的寡妇妈妈每月提供小额津贴来贴补其收入。波士顿的一个协会宣布：“有两个、三个、四个或者五个孩子的寡妇当然应包括在领取救济品的行列。”即使如此，“救助有年幼孩子的贫穷寡妇协会”（1797年在纽约成立）在分

发救助时仍十分谨慎。志愿者仔细检查每位申领者的谋生手段、特征和条件，以此确定其亲戚不能向她们提供帮助。

而且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救济是以食品、煤、衣服的形式出现，而不是分发现金。1797 到 1798 年的冬季，该协会帮助过 98 位带有 223 个孩子的寡妇；到 1800 年，有 152 名带有 420 名 12 岁以下孩子的寡妇在该组织的受助名单上。救助重点在于帮助他们寻找工作，因为协会只能够接纳那些“愿意自食其力、艰苦谋生，而不是懒惰的客户”。¹⁸ 一年内，寡妇们得到近 3000 码亚麻布和其他物质，以此来做衣服和家庭用的其他布料物件。其他组织也试图推动家庭内的工作：1816 年成立于纽约的“贝德福德妇女慈善协会”向妇女中的“勤快穷人”分发羊毛，让她们在家纺线做活。

孤儿也受到“纽约孤儿避难协会”等组织的帮助。1806 年，该协会在格林威治村租用了一栋两层楼，雇佣了一对“尽责的、受人尊敬的夫妇”作为管理者和保姆。据该协会的章程，只有无父无母的孤儿才能被接纳。有关他们的照顾和训练是这样描述的：

在该收容所内，孤儿的教育、衣食均由协会负责。他们必须接受宗教指导、道德培训，以在他们的心灵中养成勤快的意识。

收容所在那个年代仅仅意味着一个安全的地方——1806 年开始创办收容所时，只收留了 12 名孤儿，但不久就有 200 名孤儿落户。几年后，该协会因对孤儿的关怀而开始接受国家补助；这种情况并不表明类似的收容所的课程安排和救济因其对孤儿提供了帮助而被承认，也不意味着这种建立避难所的运动将直接受